

甘肃省第一届“诗歌八骏”：

他们的诗歌扎根于西部热土

□张玉玲



甘肃诗人以其阵容与实力之强大,成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甘肃第一届“诗歌八骏”的诞生,再次有力地佐证了甘肃诗人阵容之强大,实力之不俗。并且,这八位诗人的作品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也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借鉴价值。

首先,是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特色既是一个民族诗人的胎记,也是一个诗人撬动世界的支点。甘肃第一届“诗歌八骏”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所有的诗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诗歌根基放在了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将根须伸向了养育自己的那一方热土,高凯的陇东,梁积林的河西,古马的西北乃至青藏高原,胡杨的嘉峪关,第广龙的平凉,这使他们的诗歌不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更具有深沉的民族特色。而鲜明的地域特色则使得他们的诗歌成为难以忽视的“这一个”,使他们的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别具一格,辨识度高。显然,这一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中国西部不同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内地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以及西部独特的宗教底蕴和不同身份的诗人自身所独有的生命体验与个性等诸种因素相互交融的产物。尤其是严酷的雪域高原气候、浓厚的民族风情、封闭边远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使他们的诗歌与中国内地及东南沿海诗歌迥异,其中最为不同的,便是诗人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色。

如果说,诗人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话,他们所依赖的根基也就在自己的地域文化,无形的地域文化不仅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资源,也为诗人的坚守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撑。因为正是“地域”这一文化背景有可能将诗人的笔触带入与地域相关的政治、经济形态及历史与文化之中,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展示出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文化心理结构,而正是后者决定了一

个诗人诗歌的个性与风格。甘肃第一届“诗歌八骏”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诗歌的个性与风格,包括他们诗歌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风格。比如他们喜欢把花儿、民歌小调、民谣放到诗歌中,结构上喜欢使用回环、复叠,造成缠绵、伤感的诗歌意味;修辞上用大量繁复的具有异域特色的意象和比喻,造成一种陌生的语言效果和奇特的美;内在则表现为崇高、悲壮和苍凉风格的形成,特别是诗歌中的孤独意识、边关情结及雪域高原、高天厚土等生命意象。

我们不妨用八骏诗人的意象来说明这一点。诗是以语言为符号的主情的审美符号系统。它的主要元件不是词语,而是意象。意象美的创造是整个诗美创造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意象,就是意中之象。意象是引起生动经验极为有效的手段,诗人用以传达感情并暗示思想,当然也是使读者心中能重现诗人感觉的,所以它是诗人最珍贵的素材。一般说来,诗人追求的是具体,带有意象的字词,而不是抽象的,没有意象的字词。中国古典诗词总是用意象来表述诗人无以言传的感受与领悟。意象的使用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特殊表现艺术。它避免了主体的冗长与笨拙,而收到冷隽、深刻的效果,大大突出了言之不尽的内涵。而意象的锋利性与生动性一般取决于意象是否具体,诗人的情节是否有显著效果。在第一届“诗歌八骏”的作品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西部”意象:马、羊、高原、山脉、鹰、牛、豹、狼、黄河、风、石头、河水、落日、白杨、老树、老牛、黑山羊羔子、碌碡、父亲、灯、西部等。因为正是通过这些“意象”的塑造,才使得八骏诗歌有了或苍凉或厚重或沧桑的意味,这些带着诗人丰富生命体验的意象,以刹那即永恒的凝聚力量,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与理解具体化,并带给读者以陌生与惊异之美。当然,这些带有独特“西部”印记的意象也是陇军对当代诗

坛的贡献,因为它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达领域与表现方式。我们不妨试举一例:“山脊上/一匹年轻公狼回头之际/历史的天空再一次被单于的腰扭动了//雪落阴山/连夜偷袭黄河的大雪/弓弦的捷径上/只宜跑动着这一匹并不长啸的孤狼”(古马《雪》)。在这首简短的诗中,古马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西部大气而苍凉的画卷,并借着西部的地域之险写出了狼的野性之美,又借所塑造的狼意象,反衬出西部地域的险峻。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其次,是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如果说甘肃“诗歌八骏”为我们输送了什么值得珍视的精神特质的话,那就是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如果问八骏诗歌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那也是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假如说,地域特征使诗人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的话,那么,后者则使其诗歌有了心灵的深度与全人类的视野。尤其是对人类生存困境与终极的表达与追问,显示出八骏诗歌的现代性品格。而对不可见之域的抒写,使得八骏诗歌有可能跨越具体的感觉而向不存在之存在散开,这也使得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沧桑感与历史沉重感,这一特征是第一届八骏诗人对当代诗坛的贡献。

有意味的是,八骏诗人在表达这些“宏大”主题时,均是从事细微与小处着眼的,他们总喜欢把目光落在那些最普通、最平易、最容易被忽略的物件与细节上,犹如金剛钻,只盯着最小的一个点,从而达到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效果!比如,高凯写独木桥,他不写乡里人之苦,生活之艰难,而是写独木桥之险与难走:“出路和退路/都遇在了一个险要处/一根独木/担负着生命的两个部分//高于一切的粮食/一年之中要来回走几趟子/脚底下涨水/头顶上打雷/而且 每一次换季/手心都担着一把冷汗/和一把咸泪”(高凯《独木桥》)。通过写一根山里的独木桥,写出了西部山区农民生活

之艰辛。以小见大,平实的语言,却写出了耐人寻味的不平常感受。

最后,是善于使用本色语言,善于运用减法与留白。显然八骏诗人懂得简洁与本色对于一个诗人语言的重要性,并且均善于化繁为简,以少胜多。当然,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在使用减法的同时,各有自己的习惯与侧重。比如古马善于以有写无,以精练的意象来营造一种野趣与禅境,他在留白效果的运用上可谓匠心独具;高凯的减法是将大量的人生经验与沧桑感凝练为极少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与张力;离离则又不同,她使用的是质朴与真诚,不做更多渲染,让真情来打动读者;娜夜的诗则是来自于对生活细节与心灵感悟的捕捉,善于以小写大,将丰富的人生阅历简化为一两个细节,达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梁积林善于将生活的苦涩与厚重借助于自然界与生活场景进行表达,他的减法来自于对生活的熟稔与敏锐;胡杨的减法来自于对情感的隐藏和节制力,来自于对生活的苦涩感与苍凉意境的体味;马萧萧的减法体现在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跳跃与跨度及意象的惊异之感;第广龙的语言张力来自于对俗世生活的真实描写与还原能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与诗歌传统,作为偏踞于中国西北一隅的甘肃省,第一届““诗歌八骏””所创作的诗歌不仅成为我们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与关注,她将乡土气息与现代品格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为当代诗歌的创作路径提供了多种可能。她在语言和意象上的创造力,不仅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的审美感受,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语汇,为当代诗歌的语言表现力提供启示与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省的这一文化品牌的创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甘肃省第二届“诗歌八骏”：

有一种诗歌叫甘肃

□唐翰存



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名单公布的时间,正好是“国际诗歌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页上说,国际诗歌日的主要目的是推广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化形式的创作、阅读和出版,支持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在其社区内得以多样到。“作为人类灵魂的深沉表达,作为全球普遍的艺术,诗歌是对话与和睦的工具。”

不难想象,在西部,一个作家、诗人要赢得相应的名声,必须付出更加悲壮的努力。那种“一人之,我十之”的甘肃精神,在甘肃诗人中同样适用。这些年来,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为了使甘肃作家、诗人走出去,在外界获得更高的认知度、知名度,做了大量的工作。甘肃需要一个像当年《当代文艺思潮》那样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大刊,甘肃需要一个像《绿风》那样的诗歌刊物,甘肃需要一个像“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那样面向全国的文学奖项,甘肃需要更多优秀的文学活动家和策划人。“甘肃八骏”(包括“小说八骏”和““诗歌八骏””等),就是一个策划出来的品牌。作家照样是作家,诗人照样是诗人,可是有这样的品牌,其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就大不一样。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今天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聚在一起,跨越流派和地域边缘进行对话、交流,这真的是一桩很好的事情。

作为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的评委,我有幸参与了本次八骏的评选活动,也了解了其中的一些事相。首先感觉到,八骏的评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从诗人的成果量化得分到评委根据参评诗人的诗歌品质 and 诗歌影响进行打分,都是在一种很顺畅的、几乎没有争论的情况下进行的。评委们甚至不用专门去读他们的作品,因为熟悉这些诗人及其作品。评审会召集人和评委们的基本共识在于,既

要选出有实力的诗人,又要考虑到某种均衡,还要推举新人。就我个人而言,为了推举新人,我为我认为本届不宜入选的诗人打了很低的分。我应该坦言这一点。我坦言这一点,是因为我这么做是出于一种文学的公心,而不是私心。

正如高凯先生在总结本届甘肃“诗歌八骏”时,用了“新鲜”、“年轻”、“本土”、“基层”这样的词汇。的确,本届““诗歌八骏””总体面貌就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如果尝试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这八位诗人的创作,我发现他们都是有比较稳定的抒写经验,同时又有艺术上的求索精神、手法绝不老套的那种。在他们的作品中,你能找到活态的、多样性的表达:能找到乡土经验,也能找到城市经验;能找到古意深沉的传统美学,也能找到现代主义的构思方式;有直面现实的关怀,也有超现实的洒脱;有感性主义的拖泥带水,也有冷峻理性观照下的语言节制;有日常化的隐喻,也有幽微精彩的语词铸造。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发现丰富的东西。这种丰富性,也是甘肃诗歌的整体样态。曾经,外界人猜度甘肃的大学,是“骑着骆驼上学”,猜度甘肃的诗歌,是陈旧和封闭的。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可以说,甘肃诗人在艺术观念上的开放性,不逊色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往往是“杂食动物”。甘肃被称为“诗歌大省”,不仅是因为写诗的人多,优秀诗人多,还因为它出产的诗歌品相之多,杂食之多,如此,方称其为大。

可是另一方面,甘肃诗人往往比较“恋旧”。这里的“恋旧”,是指接触了某种所谓的“新”,从而怀恋更有意义的“旧”。大家知道甘肃的乡土诗比较发达,许多人写乡土,并不是因为其他题材不能写,而是因为乡土唤发了他

们最深情的内在,他们的家园意识,那种诗歌上的认祖归宗,那种根性。乡土诗里的恋旧,那种诗意美学,放在21世纪的今天,放在城镇化日益消灭农耕文明的今天,具有特殊的价值。甘肃诗歌中的地域意识也比较浓郁,字里行间往往盛放着一个西部,或显在或潜在的西部。这种对地域性的慎重,在全球化日益消灭地域差别的今天,也有其特殊价值。这些诗歌让我们想到,写作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与时代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各种主义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后者可能更原初,更长久,也更深沉。乡土和地域因素在诗歌中的附魅,体现的正是这种深沉的诗学张力。

甘肃诗人的另一个普遍性,是他们不会轻易去赶某种创作上的时髦,不会轻易投身潮流化写作,不会轻易摇摆。八骏也是这样。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出现那么多的热点事件,那么多的论争,甘肃诗人极少参与其中去凑热闹。我曾经为这种感觉到奇怪,觉得甘肃诗歌太冷静了,介入文学潮流的冲动太少了。那么活跃的80年代,在伤痕文学、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派的冲击波中,似乎听不到甘肃有力的声音,在此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中,也看不到甘肃的影子。现在想来,这也许是甘肃的缺点,但何尝不是甘肃的一大优点。正如叶延滨先生所言:“说甘肃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一点也不过分。尽管新时期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的重要演变和重要事件大多发生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但是当新闻与事件过去之后,回首文化积淀与文学成果的时候,甘肃却认真地给当代中国文坛提供了重量级的成果。”此言代表了外界不少人对甘肃的看法。也就是说,

甘肃诗人对拉旗帜、占山头、赶潮流、抢热点的淡漠,与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那份沉静和认真,形成强烈反差。在他们看来,不管这个流那个派,最终是要靠作品说话的,对一个作家、诗人来说,最终决定他的是文学实绩,而不是别的什么。上届八骏之一的女诗人娜夜曾说:“毫无疑问,诗人的任务是把诗写好。”

为了把诗写好,很多情况下,诗人其实不必急流勇进,而需要激流勇退。唐代的边塞诗就是诗歌退守的结果,是才子们从华盖满京华的长安城退出来,退守到大漠边关去,从而写出那么好的作品。从某个角度看,“朦胧诗”也是一种退守的诗歌,是剥离“大众群言”时代的高歌猛进,而退守到知识分子的“精英独白”,退守到新文化的启蒙。在当代,先锋文学的往后退,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文学的泡沫化,意识到越来越狭窄的写作路子。而在这个问题上,甘肃诗歌表现出来的那种清醒和自觉,是叫人点赞的。地处西部,本身就在一种退路上,还要退回个体,退回内心,退回艺术本身。我想起李老乡先生的近作《赛事》:“一路向西天下的红地毯/已被各路英雄走尽//落伍者与其继续前往/不如立马转身//马在回头的路上/正以蹄印 颠覆蹄印”,这几句诗,是对退守艺术最好的诠释。

被称为“八骏”,意味着要飞腾,向前是飞腾,调转马头也是飞腾。无论如何,都是因为诗歌,都是在诗歌的路上。这些马里面,有雄马、雌马,有强势的马、文弱的马,有妙笔生花的马,有沉郁苦吟的马。他们都从甘肃出发。在此,在研讨会的目光聚焦本届“诗歌八骏”的时候,我想大声念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古马、离离、李继宗、郭晓琦、于贵锋、扎西才让、包苞、李满强。

2015年11月25日 星期三



王 琰:您曾经说过欠发达地区更要靠文化提速发展。这次来甘肃,可以给我们谈谈您对甘肃文化发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吉狄马加:甘肃是青海的近邻,同样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从文化地理学来看,甘肃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长的地方,这里的文化生命力极为强大,特别是这里的各民族文化,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原生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非凡的特质,尤其是它包含着的创造力和爆发力,可以说都是中国西部文化的精髓。用一个诗人的眼光来看,甘肃的文化资源是许多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这绝不是我的溢美之词,因为甘肃的文化具有一种纵深感,这种纵深感依托的是一种它从未被中断过的历史文化传承,另外,甘肃还具有许多代表某个历史时期最高端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敦煌莫高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我已经注意到,甘肃省正在着力打造一系列文化品牌,特别是注重依托本省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理资源,来为这些品牌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加大了对这些品牌的高水平策划,我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甘肃一定会产生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品牌。近年来,甘肃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丝绸之路的学术论坛,有关发展和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会议,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一切都反映出甘肃的文化自信 and 创新能力,我对甘肃发展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同样也充满了期待。

王 琰:感谢您专程来兰州出席甘肃文学诗歌八骏文学活动,我们再次感受到您对诗歌活动的重视和对诗歌的挚爱。可否谈谈您对甘肃文学八骏的看法和期望。

吉狄马加:我可以负责地说,甘肃是一个诗歌强省,多少年来甘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诗歌生态,这个生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二是有一支不同年龄段的诗人队伍,在全国许多重要的文学评奖中,都能经常看到甘肃诗人的身影。最为可贵的是,在同质化写作的今天,甘肃诗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文学气质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我以为这和甘肃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关,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放弃、而必须被长期坚持下去的优秀品质,也可以说这是甘肃诗人的立身之本。这次研讨的“甘肃诗歌八骏”,其中有“60后”的古马和于贵锋,还有离离、郭晓琦、包苞、李满强多位“70后”诗人以及李继宗、扎西才让等少数民族诗人,毫无疑问,这个阵容是令人可喜的,我相信这个研讨会一定会取得成功。

王 琰:您曾经有近20部诗集问世,商震在《吉狄马加:永远的诗人》一文中,用谦和、宽阔、诚恳、睿智、粗犷、率真、悲壮、血性、忧郁……来素描现实和诗境中的您。其中我最喜欢《一个彝人的梦想》,可否以此为例,谈谈您作为一位彝族诗人的民族性与独特之处?

吉狄马加:对我个人的创作,特别是作为一个彝族诗人,我想在这里说三句话,一是我的诗歌的精神源头,或者说作为一个诗人我背后的强大的精神背景,将永远来自于我的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和传统;二是我的诗歌的民族性和独特性,从来不是封闭的、狭隘的、缺少创造力的,我以为任何民族性和独特性,都应该具有一种开放性,民族性和独特性决不能与人类性相对立,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具有人类意识,否则他的诗歌将不会在别的民族中获得价值认同;三是诗人既是他那个民族忠实的儿子,同时他还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儿子,他应该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怀,同样,他还应该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

王 琰:这个时代的变革如此巨大,以致我们身处其中应接不暇,难以把握和理解。诗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和孤单无助。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诗歌主体性的迷失使我们已经来到了诗歌信仰缺失的时代?

吉狄马加:我历来认为“诗人”是一个社会角色,而不是一种传统的公共职业,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将穿越我生命的所有生和全部的死。

关于诗歌主体性的迷失,是当下许多诗人和评论家议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我以为,有这样一种关注和思考,说明我们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已经看到了当下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说明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已经在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评价诗歌存在的价值,这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碎片化的写作,从世界诗歌史的发展来看,与19世纪相比,我们今天的诗人都缺少大诗人的气度,就是和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叶的大诗人相比,我们今天的诗人就格局而言也是小的。我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说要求诗人们都去写一般所谓社会意义的诗歌,而是要写出真正具有精神高度、又能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诗歌。最近,我正在重新研读俄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他们给我的启发和思考都是巨大的。

□吉狄马加 王 琰

甘肃一定会产生国际性的文化品牌